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十一期 ——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11d)

【研究报告】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 ——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 (上)	孙万国
【自由论坛】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	谭天荣
【书刊评论】序《卞仲耘之死》	胡 平
【抗拒遗忘】为了法律的尊严——读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有感	格丘山
【更正启事】“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文中笔误更正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
——毛泽东晚年的中国精英政治危机应对 (上) (1)

• 孙万国 •

“天安门事件是主席亲自抓的……，开始北京民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当暴徒）搞反革命暴力时，我们就要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我们）拿起棍子（但没用坦克和机枪——作者注），中央（毛）明确交待，可以还手。”

——姚文元 1976年4月26日谈天安门事件 (2)

在某些方面来说，先前学界对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晚年的理解，要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现实。“文化大革命”的包袱确实让中央政治局乃至全党陷入尖锐的分裂与冲突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角大体可分为三批人马：一是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分子——这一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毛本人的误导。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为其杰出代表，尽管周与邓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像的复杂。(3) 三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既是文革前中共体制中的骨干，又是文革受益者。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极其突出。

但其突出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原先的革命资历甚低，而非由于特殊的政策走向或集体利益使然。这些人物之外，当然还有最为关键的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一向超然于各派斗争之上，但也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厌反复地出面支一派，打一派。尽管到了晚年，重疾缠身，但他对形势的掌控与主导，其实要比人们想像的更加介入。即以这一时期为例，1975年温和政策的决策者毕竟是毛，而不是周和邓，正如他先前是发动天下大乱的文革始作俑者一样，“四人帮”不过是跟着起哄的追随者罢了。

虽然学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解，大体不差，但就其研究细节来说，却与事实相去甚远。个相屡屡失真，总相必然偏离。在现存的党史中，便不乏以讹传讹，愈演愈烈的弊端。人们对于1976年4月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通俗认识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这些说法，极左的激进派要么是经过精心盘算，要么就是出于自身愚蠢，居然敢对尸骨未寒的周总理发动批判。他们又与华国锋及其它文革受益者勾结，共同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因为勾结的双方都体会到深得人心的邓小平的威胁，故不得不联手应付天安门危机，尽管极左派并不满意华的高升。这一勾结，直到镇压之后，“四人帮”还处于陶醉情绪时，双方的同盟关系才告破裂，这是由于华一心想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四人帮”又难与其他“文革”受益者和睦相处。对于这类说法，我们未敢苟同。鉴于现有史料诸多空白，又自相矛盾，要对天安门事件中高层决策的来龙去脉彻底清理，显然不可得。但也无妨我们在此尝试有别于前人之说的历史重建。

◇ 引子：周恩来的葬礼，清明节来临，南京事件

4月初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自发游行示威，无疑是中国百姓对中共当局的首度挑战。导致这一严重事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们所爱戴的总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哀荣，人们也觉察到上层对于周一生的功过评价存在着斗争。清明节本是祭奠先人的扫墓日，随着清明的临近，形势越加严峻。紧张局势始于一月初总理去世随后，当局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有“五不准”：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不准挂总理像。但民众对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会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动，这就更加激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4）

群众的不满又不免与1975年底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起来。他们的不满，不仅是“批邓”，也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乃至对于毛泽东的信仰发生动摇。从上层到地方的极左派执意批邓，以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而群众则浸沉于他们丧失了代表温和和正义的周总理的悲痛之中。人民悼周，左派批邓，这就构成了尖锐冲突的局面。其实，极左的四人帮未必希望总理早逝。他们认为在此批邓的节骨眼上，周的不合时宜的弃世，必然冲击“批邓”的政治运动。当局急于结束悼周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尽快开展批邓。总之，随着运动在2、3月份不断升级，人们很自然地把对于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批判，认为是对周总理的批判——尽管事实上周并未积极参与1975年的政策，而邓小平的整顿决策原本基于毛的授权，有些甚至是出于毛本人的授意。妙的是，最早把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右倾”联系一起的，反而是极左派。他们掌握官方媒体，偶尔对周进行不点名的批判。（5）人们对此，未必尽知个中原委，但总本能地感觉到官方批右倾必然会损及周恩来的身后之名。（6）引发天安门事件的初始原因，虽说是1月间对群众悼周的悲痛之举突遭打断，但此一情势很快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派系斗争纠缠起来。（7）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呼声。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如何开展“反右倾”运动，多数成员不主张采取当年红卫兵大串联的那套文革方法，而要把运动置于党委控制之下。3月24日，毛主席批发了这一决议。（8）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南京事件爆发，对于稍后的天安门事件构成了重要影响。

24日那天，南京医学院的学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献上了当地悼念总理的第一个花圈。这一行动本身并无独特之处，北京从3月中旬就开始了类似的悼念活动。问题在于，一位摄影

师记者取走了花圈上的挽联。他未必出于恶意，但流言则说他是受了“上海帮”的指使。第二天，学生们为此在南京市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标语。何其巧合，当天上海的左派《文汇报》也发表了头版文章，声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文章虽未点名，但读者心知肚明，这是影射周恩来。与此同时，当局又下令禁止人们前往雨花台，这无疑是火上加油。此后几天，学生不顾禁令，继续游行示威，并张贴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从3月28日起，还点名批判张春桥和江青。这些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触发了其他地区类似的活动，特别是华东地区。（9）鉴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愈演愈烈，王洪文在观察了两天之后，于4月1日，代表中央下令江苏省委清除大字报，并制止反革命言论。按邓小平下台后，虽有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大约还是王洪文替代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4月4日，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当局的敷衍，仍允许群众前往雨花台祭悼，这一地区的秩序大体恢复。但在北京，则事端迭起，形势反趋恶化。（10）

虽然当局封锁新闻，但人们通过口头传播及开往各地火车和汽车车身上显目的标语，南京事件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地区。由此揭开了天安门悲剧的序幕。值得一问的是，4月初之前发生的这些事端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应为之负责？学者都说这是《文汇报》惹的祸。它在3月25日的文章里，明确把周总理与邓小平的政治错误拉扯一起，人们反因此误以为周邓关系密切，也误以为邓的复出是由于周的提携。（11）我们在下文中会提到，在高层政治的漩涡中，邓小平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焦点，尽管他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干系。而在下层，邓岌岌可危的处境显然也是一个因素，但他对局势发展的影响其实是很有局限的。不论是南京事件、或稍后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其他省市的类似示威活动中，邓的名字只见偶然提及。（12）其原因当然是由于邓已挨批，群众的悲痛情绪反而集中在周身上，实质上是抗议毛和极左派对于周的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帮”对于周总理的敌视自然引起群众的愤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抨击极左派时，依然使用了极左的文革语言。南京反对张春桥和江青的标语远远超过了几个月前零星的批评。其严重程度连讨厌“四人帮”的其他中央领导也难袖手旁观。正如汪东兴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说的：“（天安门事件）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是对四人帮不满，是有的，但那时也分不出，他们还在台上嘛！”（13）

谁应对这种失控局面负责？迄今无论中西学者都把帐全算在江青一伙身上。根据此说，《文汇报》谤周的文章、先前对总理的种种大不敬，以及他们在天安门危机中的表现，都是“四人帮”有意制造政治分裂，藉机把邓小平赶下台。（14）在某一程度上说，中央的极左派当然要对这种局面负责——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批邓”，调门甚至高过毛本人设定的界限，一方面又完全蔑视人民大众对周的感情。然而，尽管当时人们认为张春桥是《文汇报》的后台老板，但我们迄今并不甚清楚谁应对此挑衅的文章承担具体责任。换言之，这篇影射总理，引起众怒的文章到底是出于北京方面的策划，还是上海当地宣传干部头脑发热的自发产物？需知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上海就有此先例。当时上海的激进派领导仍按“文革”那一套思维，私下批评邓小平是走资派，以至于张春桥不得不出面制止。（15）再说，当时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报纸并未转载。由此看来，这一闯来大祸的奇文恐怕是出自地方手笔，而非中央。

此外于4月初在杭州出现的活动，亦可旁证《文汇报》擅自诋毁总理的文章源自上海的当地领导。按杭州情势的严重程度大约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杭州群众显然受到南京事件的感染，但似乎更关注邓小平的命运。他们张贴大字报呼吁邓小平不能下台，并赞扬他贯彻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政策。（16）最堪注意者，是杭州群众在普遍反对极左时，其主要矛头却是指向地方领导人，特别是上海的第一把手马天水。他们要求打倒野心家马天水，追查他所散布的政治谣言——显然是指他在1975年6月向“四人帮”密报邓小平企图拉拢他的事。马天水既是《文汇报》的顶头上司，自然要为诋毁总理的举动负责。（17）

当然，最终的责任毕竟还是人所熟知的源头——毛主席。简而言之，毛对于周，一向不大

感冒，这就怂恿了那些批周的领导人。周在生前，屡遭毛的奚落；周在死后，也只见毛的冷漠。毛拒绝出席周的追悼会，就是这种冷淡的体现。他不但拒绝了40名元帅和将军联名请求他在追悼会上露面的建议，还说，他们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18）犹有甚者，毛还反对在悼词中把周说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武断地认为周不但自己反对文革，还影响其他人也反对文革。他说，“总理是反对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一小批，还有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这里真是明白不过地显示出毛泽东深重的文革情结。对毛来说，未来的政治比过去的恩怨更重要。之所以压制悼周活动者，未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而是考虑中国的未来。因此，他在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6个字，“悼念虚，复辟实”。为了让人明白无误，他还让其侄子兼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政治局传达了这一指示。（19）

◇ 天安门广场事件

以上所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背景，大抵有此数端：群众执意悼周，而毛则设限低调。邓小平失势后，政局急剧左转，引起人民广泛的不安。毛泽东本人则在林彪事件后，威望日渐低落。而被视为总理对头的“四人帮”更招来积怨高涨。以下将首先回顾广场事件，然后转入我们分析的重点，即中共的高层政治，藉此以观当局如何应对天安门危机。

天安门事件的轮廓倒也清楚明白。在3月19日，首先是一批小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全国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也预示着清明节的临近。这只花圈，和随后送去的，很快就遭清除。北京市公安局还奉命要把上广场送花圈者都记录在案。显然，花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汇报说“这些花圈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映”。到了3月30至31日，“南京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花圈数量激增。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里充满了反对“四人帮”的情绪。涌入广场的人数也开始剧升，从3月底到清明节夕，共达到了一百多万。在这段时间里，当局的态度基本上可谓是谨慎从事。一方面，于4月2日在广场一隅设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的联合指挥部，并发布指令，谓清明节是旧习俗，要求各单位阻止职工上广场。同时又宣布南京事件是一场“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当局并没有对广场上的群众采取大规模打击行动，只除了审慎地逮捕了少数闹事者，并移走了若干花圈外，并无其他乱象。因此，4月3日那天，尽管是个情势紧张的星期六，广场上仍颇有秩序可言。（20）

清明节这天恰逢周休日，大约一、二百万人涌进了广场。带来了更多的花圈、诗词、传单、小字报，以及即兴演说和喧哗。局面愈形紧张，人群中发生了零星的打斗，有些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受伤。走上广场的绝大多数只为表达他们对总理朴素的感情，但也有不少带有明显的政治气味，把周恩来和时下反击右倾翻风运动联系起来。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四人帮”的指斥，主要是针对后者反对总理的行径，而非针对具体的政策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广场上出现过数串“小瓶”，但公开提到“小平”的却很少，甚至比不上外地。这表明，尽管大伙拥护邓小平，但在此时情绪激昂的广场上，人们还是自觉地遵守政治上的界限，不敢公然反对当前的批邓运动。如在南京一样，广场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举动，不外是或明或暗地攻击政治局里的极左人物，尤其是江青与张春桥，还有姚文元，但似乎无人针对王洪文。（21）

当然更加敏感的问题，是对毛主席本人的不满。广场上的愤懑，不仅间接地触及当前的政治运动，还触动了毛生平最感自豪的文化大革命。个别少数的大字报与演说，尽管没有指名道姓，显然是冲着毛泽东而发。比如有一幅十分醒目的标语，即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对极左人物的痛恨，与对毛的大不敬。它说：“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意指毛泽东），更不要那拉氏（江青）。”当夜幕降临后，灯光之下，人们放眼所见的是层层堆满于纪念碑前献给周总理的花圈，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肖像。这就构成了一幅象征周、毛对抗的巨大画面。这种画面在周恩来生前，当然是不可想像的。对于这一严重的挑战，政治局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正如汪东兴七个月之后解释的：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没有错，但攻击政治局委员就成问题，攻击毛主席则更是大逆不道。（22）

于是，政治局决定在清明午夜过后搬除花圈，清理广场。当晚滞留在广场上的少数人群也遭拘留。到了5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报果然都消失了。由于当局事先未加解释，丢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早上8点，广场上聚集了近一万名激愤的人群，后来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发生了官民的对峙和摩擦。人们挤满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并掀翻了一辆高音喇叭广播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警车。下午5时许，群众又捣毁和点燃了联合指挥部。整个事件，根据现场目击者罗杰·嘉赛德的报导，直到此刻，民警和民兵都还非常克制，没有进行逮捕。到了灯光亮起时，群众已逐渐减少。6点30分，北京市长吴德播放讲话，谓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制造政治事端，呼吁“革命群众立即离开，不要受到蒙蔽。”吴德的讲话反复播放后，人群进一步减少，只有数百人仍滞留纪念碑周围。晚间11点左右，民警和民兵终于冲进了广场，对人群进行一阵短暂的毒打，并把受害者拖上卡车拉走。之后宣布广场戒严，但并未严格执行。次日至广场向周恩来表忠的人数仍达数千之众。他们照样献上一束花圈，但这回民兵并未干预。有些人也照样声讨江、张、姚（也还是未提王洪文），但气氛已较日前平静，当局亦未进一步的镇压。总之，大规模群众的抗议已遭瓦解，天安门及其周边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23）

在转入讨论党的高层如何回应及处理危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略考察一下，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力量实际推动了天安门事件。嘉赛德认为，其中有为周恩来鸣不平，有对毛泽东的反叛，有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以及对镇压者的抗议。嘉赛德和其他观察家都认为，几乎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包括最贫穷无告者，都参预了这一抗议活动。而来自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三总部的花圈，乃至身着贵服的高干出现，也意味着高层势力的影响。（24）的确，三周之后，4月26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干部谈话时说：“为什么这时要爆发天安门事件？（即使）没有悼念总理为藉口，也要爆发……我看一是批邓深入了，打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痛处。一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他继续说，尽管广场上工人阶级最多，但知识份子才是“最野蛮的”真正闹事者，尤其是科学院、七机部、外交部的那些人。他也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25）姑且不论其社会根源，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群众的组合，就像南京等地一样，既有对上层政治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也有略闻上层内斗气味、却未必知其真正底细的人。但这两类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一致缅怀他们熟悉的总理，一致痛恨极左人物。

不管工人和知识份子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姚文元所持天安门事件“总要爆发”的估计，在我们看来，未必站得住脚。试想，若无悼念总理这样名正言顺的藉口，若无当局压制悼周活动因而激起普遍的愤慨，那么，就算民众对文革日益不满，在寻常情况下，这种大规模情绪的大爆发，有可能说发就发么？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下一节要探讨的，假若当局遵守北京市委与群众达成的默契，让花圈在原地保留数日，待得群众情绪平和之后，则流血事件未尝不可避免。再说，尽管不少人藉机发泄他们对时政不满，但绝大多数群众并未公然挑战当局的批邓运动，这说明民众本在自觉地克制。如果当局稍安毋躁、妥善疏导，亦未必引爆天安门事件。毕竟引爆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是关于周的问题，而非邓的问题。至于中上层机关干部的作用，姚文元的说法亦有夸张之嫌。当时有一椿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参加追悼活动的单位逐渐升级，先是小学生上街，后有中学生，最后才是中央政府机关。这说明机关干部也在谨慎地解读当局的容忍程度。更关键的一条是，并无任何迹象表明高层领导曾在背后操纵事件。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确实是来自基层民众，也许正如张春桥所说的“匈牙利事件”。但邓小平并非纳吉，其他高层领导亦未插手。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当权人物从骨子里就明白，如果支持天安门前的民众，无异于政治上找死。邓小平对这一点比谁都清楚。他不但自己不去广场，还嘱咐子女也不要。当江青等人指控邓小平曾至广场坐阵指挥时，华国锋和汪东兴都表示怀疑——毛泽东当然更不会相信。（26）

（未完待续）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 【自由论坛】

### 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

• 谭天荣 •

1968年我曾作一次尝试，根据我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述从新中国成立起到那时为止的历史进程，并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讨论涉及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良心”。对于这些人，我在这里对新中国历史的描述只能激起狂怒。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影响的不仅仅是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还将影响今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基于此，超越意识形态限制 讨论毛泽东身影笼罩下的新中国历史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 一、新中国历史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的历史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展开的。为了描述这一段历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多年战乱（8年抗战、3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如一盘散沙的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中国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条件使得这一矛盾对于新中国更加突出。

第二，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说，当时中国只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此外的大约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的初始条件：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工业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呢？

因为大工厂几乎都在城市，毛泽东这里说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可等同于“城市经济”，而古代的经济则等同于“乡村经济”。如果把当时的乡村隔离起来，即假定占10%的城市经济根本不存在，那么在这个古代的经济基础上，将长出一个古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把城市隔离起来，即假定占90%的乡村经济不存在，那么，这些经过民主革命的现代城市，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代表现代性的城市经济的政党领导下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城市。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毛泽东自1949年以后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却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新世纪的“秦始皇”和一个“在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暴君。当毛泽东说 he 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义。

## 二、小农的王朝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城市，从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自然长出来的国家形式，就不同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它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呢？在世界历史中曾经有过两个先例，一个是20世纪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形式，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铲除旧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国家（表现为一个“暴君”）通过机关和军队直接对社会进行统治。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特征现在被统称为“个人崇拜”。迄今为止，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产生个人崇拜，仍是20世纪历史最大的不解之谜。至于拿破仑主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下面简称《政变记》）一文刚好对它作过详尽的考察。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仑主义国家即波拿巴王朝。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家族曾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家族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考察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乡村的政治影响毕竟不如城市。代表乡村社会关系的“第二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由于城市的各敌对阶级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刚好让“第二个波拿巴”钻了空子。但在新中国，乡村经济本来就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土地改革使乡村居民一度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启动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影响一开始就大大超过城市。由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小农的王朝”将比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接近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

那么，“小农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在《政变记》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一切关系和个人齐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同样的群众在一切方面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着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及其直属机关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在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这一基地上很快就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化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权力贵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一个权力无限的最高主宰。在新中国，这一要求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南海的主人——“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和袁世凯不同，他没有龙袍，也不需要龙袍。

下文考察小农的王朝的这两个要求在新中国实现的过程。

### 三、新中国的干部与群众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政府构架基本上模仿苏联，而那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土地改革、改造私营工商业时，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人在内）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在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藉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并未随着这一声炮响送过来。考虑到这点，就不必惊讶共产党政策的实际社会效果远远偏离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一目标。

新中国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是，即使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因此而消失。要在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就得发展现代工业，就得有社会分工，应用科学技术，由此而需要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才，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就会形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然而，要认识新中国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

按照官方的说法，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土地、在土改复查中被没收了所有浮财的地主，仍然是地主；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世代仍是“地主阶级出身”，受到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而事实上，“土改”之后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人的区别仅在于历史。至于地主子女和农民子女的区别则仅在于血统。在世界历史上，“阶级”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按血统划分。因此，土改之后“地主”这一称谓不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一个种姓了。而新中国自19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种姓迫害”。这种冒称“阶级斗争”的种姓迫害，一直掩盖着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这种荒谬的种姓迫害，还使得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名声狼藉。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然而，在这一时期，真正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本身也是隐蔽的。首先，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从小商店的店员到大厂矿的经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火车司机到交通部长，都是国家的“干部”，即官僚和职员。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未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农民占优势的国家，情况怎样呢？

马克思在《政变记》中曾这样论述上世纪的法国官僚：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官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上述所有时期，官僚都力求达到了个人专制。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于城市中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一时间势均力敌，乡村的社会关系暂时占了优势，官僚们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了，他们本人成了统治者。

由此可见，官僚本人成为统治者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乡村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优势，因此官僚本身一直都是统治者。在这里，官僚与农民乃是乡村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与资产阶级相对立，也与无产阶级相对立。在这种意义下，“第二个波拿巴”和他的同僚乃是当时法国农民的代表。但是，第二帝国的“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作为农民的代表者，并不是农民领袖或农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他们组成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大多出身于农民，在建国之前，他们在乡村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进城”之后，由于地位的改变，由于乡村的政治影响，他们很快形成“一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但是似乎不能说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这是因为，在法



兰西“第二帝国”，除了官僚这个“人为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由社会各真实阶级构成的公民社会。但是在新中国，原有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被干部等级制度所吞并。除了“干部”，社会上就只剩下市民和农民了，而这些居民则被称为“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新中国的基本阶级结构就是“干部”与“群众”的两极对立，其中的一极是“富贵豪华的官僚”，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另一极则是极端贫困与无权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工人、知识份子、市民、一般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就成了两极对立的中间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最纯粹、最极端的形式。

#### 四、新中国的农民与工人

人们说，1949年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原是摆脱封建桎梏、铲除封建不平等、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而1949年革命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驰：它建立的干部等级制度把旧社会的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大批干部有旧社会剥削者的收益而没有旧社会剥削者的劳累与风险；它建立的“阶级成份”制度把印度那种按血统定尊卑贵贱的种姓制度移植过来，将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以及后来的“右派”等强行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铲除的封建不平等。然而，更致命的封建不平等还是由户口管理制度维持的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是新中国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基本特征。

阶级压迫与剥削总对应于一定的剩余价值形式。如果说，佃农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地租”，那么，自耕农的剩余价值形式就是“赋税”。新中国的农民也交农业税，但那并不是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对于他们，主要的剩余价值形式是“征购”。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必须把“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显然，只有统购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时，统购才是必要的。那么，对于小农来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小农集小地主、小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于一身，作为小地主，没有地租他也得种地，作为小资本家，没有利润他也得种地，只要他能付给自己作为农业工人的工资。换句话说，只要他还能活命，他就会去种地。因此，“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份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这就是说，即使农民按市场价格出售粮食，他们也就刚刚能活命。现在强迫农民按更低的价格出售，试问把农民置于何地？在新中国，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例如，吃面包喝牛奶的洋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吃糠咽菜长大的中国乡村孩子则“生活在蜜罐里”。早在1953年，乡村居民就已经进入“蜜罐”了。接着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在这次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耕牛和农具，得到了一副锁链。对此，农民虽然不满，还得敲锣打鼓表示欢迎。

乡村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相应的变化：与粮食的荒谬低价对应的是工业品的荒谬高价。这种荒谬的价格不仅导致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还导致一种荒谬的理论：“一个工人一年创造一亿人民币的价值，而一个农民一年只创造几百万的价值。”马克思的不肖子孙竟然忘记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荒谬的价格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乡村居民，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劳动力的流动，就实行了“户口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赋予城市居民种种特权，让城市居民天生高贵而乡村居民天生低贱。

城乡差距使得“下放农村”成为一种政治惩罚手段。仅是面临“下放农村”的万丈深渊，就足以使每一个城市居民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新政权利用工人阶级对享受特权的感恩和对失去特权的恐惧，把它收编成自己的“近卫军”，在历次运动中用来恫吓、压制和攻击知识份子和各种不够“驯服”的人。新中国的御用工人阶级被动地写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可

耻的一页。

## 五、群众运动

世界历史证明，即使有某种不平等也可以建立法制。在古罗马帝国，虽然有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罗马法还是保障了自由民内部的平等。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各蓄奴州，虽然有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是保障了白人内部的平等。那么，能不能想像在新中国荒谬的种姓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下，把某些人划为“人民”而把另一些人划为“敌人”，再制定某种保障“人民内部”的平等的法制呢？不可能！

1949年的革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根据当年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建立的却只能是一个小农的王朝。这个王朝只可能是一个“人治”的古代国家，而不可能是一个法制的现代国家。此外，新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偏爱——更使得任何法制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中国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打下的天下，自然对群众运动情有独钟。它依靠“人民公社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了堪与安徒生《皇帝的新衣》媲美的童话；它依靠“大跃进运动”来“发展生产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与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迥然异趣的滑稽剧。然而，中国共产党最得心应手的还是靠群众运动来铲除异己。这种群众运动的典型程式是揭发、批斗、处理三步曲：

第一步，先动员群众相互检举揭发，其内容往往是私下谈话和私人信件。私下谈话无据可查，真假难分。运动的领导人为了动员群众，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私人信件虽然白纸黑字，但怎么解释却可随心所欲。

第二步是“批斗”，在这一阶段，一部份群众被指定来“批斗”运动的对象。对这一部份群众来说，重要的是“体会领导意图”，至于有没有事实依据倒并不重要。不必担心有人会辩解，被批斗的人唯一的权利是不分皂白地“承认”。也不必担心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谁提出异议谁就会立刻成为运动的对象。对于运动的领导来说，不论批斗怎样离谱，支持批斗就是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稍加劝阻就会使人产生批斗过火的“错误印象”。因此，领导对于“群众的批斗”只会火上加油。至于领导从“群众的批斗”得出结论的艺术，恐怕连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经》也要黯然失色。

最后一步是处理，轻则降职降薪，重则被开除公职成为“人民的敌人”，或者被判刑、劳改、枪毙，因此而空出的职位，则理所当然地由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来占据。或许，不用多久，事实证明某一积极分子的检举不过是私人报复，某一积极分子的揭发不过是张冠李戴。但是，那又怎么样？运动已经结束，这位积极分子已经升了官，难道再降下来？尽管他说的不是事实，他的立场还是正确的，还是“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的。再说，运动的对象有一定比例，这位积极分子的检举揭发，至少在凑足名额、完成运动的指标这一点上立了大功。

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人民的敌人”的队伍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靠运动起家的人的队伍也逐步扩大，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尽管不少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下次运动中又成了运动的对象，但总的来说，这个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多，权力日益膨胀。不言而喻，这个阶层的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卖友求荣。而这一准则自然被他们奉为社会主义的最高道德准则。于是，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知识份子的气节以及共产党标榜的实事求是作风，都成了“反社会主义”的。至于民主与法制，自然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了。如果说，“大炼钢铁”运动剃光了无数山头，给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几十年也不能恢复，那么，这种卖友求荣的“道德准则”

对群众心理的摧残，给中华民族所留下的精神上的创伤，恐怕几百年也难以痊愈。

## 六、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上述几方面构成了新中国奇特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体制。中国式种姓制度、户口管理制度和群众运动是它的三大支柱。中国式种姓制度使得人们得以用“阶级种姓”迫害冒充阶级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一部分劳动者对另一部分劳动者的经济掠夺，从而掩藏了不劳动者对劳动者的经济掠夺；群众运动则使人民群众经常处在一种自相残杀的状态，并把一切反抗扼杀在萌芽中。正是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党转化成为新兴的权力贵族，伟大领袖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

权力贵族和皇帝，这是1949年革命的种子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土壤中长出一对并蒂莲。它们的生命力都来自共产党，权力贵族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而皇帝则拥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们有各自的社会基础，权力贵族维护着城市居民的种种特权，而皇帝则得到乡村居民的道义上的支持。然而，不论这一对并蒂莲怎样相互依偎、相互缠绕，它们却天生是对头。新兴的权力贵族要求确立稳定的贵族——平民两极社会，这意味着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与机构，这一要求被表述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新登基的天子则要求建立一个正式的“皇帝—臣民”的两极社会，这意味着在新社会的机体上割去“伟大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共产党，而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消灭三大差别”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于是，新中国的城乡矛盾在当时就表现为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

乍一听来，这一论点简直是“天方夜谭”。谁不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党史就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即使有矛盾，那也只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这里怎么会有什么对抗呢？不能否认，的确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当年打江山的时候，毛泽东与共产党是等同的概念；但现在是在坐江山的时候，毛泽东必须铲除共产党。即使对新中国的社会历史一无所知，只要翻一翻中国的编年史也能知道这一点。汉高祖为什么要杀功臣？因为打江山的时候需要人才，而坐江山的时候却只需要奴才。不幸的是，韩信与彭越等人为刘邦打下天下之后，仍然还是人才。刘邦不得不铲除他们。既然刘邦一定要铲除韩信与彭越，毛泽东又怎能不铲除彭德怀与刘少奇？

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怎么可以把新中国和汉王朝相比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是的，新中国成立时距汉王朝已两千多年，可谓久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直到1949年，中国还有90%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也就是停留在汉代；再说，毛泽东与刘邦都是借助于农民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因此，我们实在不必惊讶新中国和汉王朝之间具有某些相似的社会历史特征。江山坐稳以后，皇帝杀功臣正是这样的特征。当然，新中国与汉王朝还是有所不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是一个个为他打天下的功臣，而新中国的开国皇帝要对付的却是一个他自己领导的，缔造了新中国的政党。如果说，刘邦不得不一个个地铲除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那么，毛泽东就得铲除共产党了！自古以来，在天子的视野里，除了三宫六院、粉黛三千，就只有宰相、群臣和百姓，哪能容得下什么党？

诚然，天子也要靠宰相和群臣来治理百姓，但宰相和群臣虽可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职能只能是“听差”。不幸的是，共产党却远不是一群听差。它天生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纲领完整的共同体，并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权力贵族并不排斥一位“伟大的领袖”，只要他维护权力贵族的权益，这样的贵族领袖相当于“立宪君主”。同样不幸的是，代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毛泽东也远不是一位立宪君主，数亿农民要求他成为

高高在上、不受任何限制的“秦始皇”。这种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了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腥风血雨的对抗，正是这一对抗奠定了新中国不断动荡的历史的基调。

如果我们抬头看看北方，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苏联历史上的种种令人困惑的事件，特别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清洗”，如果不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的表现，又能是什么呢？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正是苏联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同样，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则是新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 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人们根据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在它执政的新中国，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它的领袖毛泽东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那么，怎见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呢？不是因为它的党员出身于无产阶级，也不是因为它的支持者是无产阶级（它的党员和支持者绝大部分是农民），而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一直被看作天经地义，但得出这个结论的整个推理却是因果倒置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不决定于它所标榜的指导思想，而决定于它所处的实际地位。诚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从苏联引进的列宁—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再经过毛泽东的“创造性的发展”，与本来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相径庭，实在称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学说”。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成长的，在1949年以前，它仍不失为一个革命政党。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转化成为权力贵族，不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的改变而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改变；不是由于它缺乏先进理论或缺乏共产主义信念，而是由于“理论”和“信念”斗不过“利益”。因此，当人们根据“指导思想”来确定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时，他们其实错误地应用了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

当然，列宁的这个命题本身也有问题。马克思在《政变记》中曾这样描写那次政变的结局：“法国逃脱整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不必深入这句话的内容就能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把“整个阶级的专制”和“一个人的专制”区别开来。而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整个阶级”是由某一政党来代表的，而该政党则是由一个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整个阶级的专制就是这个领袖的专制，从而也就是“一个人”的专制；反之，一个人的专制也就是整个阶级的专制。列宁的这一命题明显地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矛盾。

应用列宁的这个命题，人们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却无法理解世界历史中更具体的内容。例如，人们很难把以希特勒为元首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以罗斯福为总统的美国代议制政权区别开来，因为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本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按照这一命题人们还可以断言，欧美各国人民几个世纪的斗争差不多一无所获，最多只不过从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另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只有1917年俄国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十天”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上面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问题的细节，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就越是显得抽象而空洞。一般地说，列宁的这一命题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更夫的老生常谈：“一切猫都是灰色的。”不幸的是，列宁的许多“理论”都是这种抽象而空洞的老生常谈。更不幸的是，正是这些老生常谈被人们奉为“列宁主义的核心”，奉为“试金石”、“分水岭”等等。对于这些老生常谈，我们不能苛求列宁。列宁是一个大忙人，他

有太多的事情要作，实在没有时间来仔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更没有时间来仔细研究世界历史。至于列宁的老生常谈特别受到青睐，倒也不难理解，老生常谈毕竟是人们特别是懒人最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以这些“核心”、“试金石”和“分水岭”之类为基本内容的所谓“列宁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只是一个垂死的宗派，它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科学越离越远，还总是不断地被当代的世界历史所嘲弄。

然而，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命题所导致的最致命的混乱，还是对“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两个概念的混淆。若按照列宁的命题推理，一党专政只能通过该党的领袖来实现，从而就只能是这位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样就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等同起来了。这种概念混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例如，人们曾谴责国民党的统治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谴责它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似乎没有人感到这是两种不同的谴责。除了理论上的失误以外，特殊的历史条件也促成了这种概念混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不幸的是，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却表现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统治形式，它们之间的对立乃是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关键。前者是对权力贵族的统治的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后者则是皇帝统治的一种比较一般化的称呼。谁要是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他就完全不能理解新中国的历史。

## 八、“引蛇出洞”？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一事件在中国产生了各种效果，其中之一是权力贵族的统治从此被称为“集体领导”，而皇帝的统治则从此被称为“个人崇拜”。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由于当时中苏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在苏共对中共的传统影响下，“八大”作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新兴的权力贵族与新登基的“皇帝”的蜜月结束了，这两种力量开始了第一次较量，结果是权力贵族获得了胜利，但只是短暂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是1957的“整风”与“反右”，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在号召“给党提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并反复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起，毛泽东又突然翻脸，发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是不是象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个“阳谋”呢？

如果把195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里的大字报与9年后同一时期在同一大学里的大字报作一比较，我们会得到一定的启发。1957年北京大学从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在毛泽东“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遭到镇压。1966年5月25日（又是一个多事的五月），北京大学又一次出现了大字报，不久就有工作组的进驻。工作组的部署是：“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才是真正的“引蛇出洞”，但它并不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明确表态：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

另一方面，在1957年，学生们向共产党提的意见虽然相对温和，但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当作共产党的代表。与此相反，1966年的校园英雄聂元梓、蒯大富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于工作组来说，牛鬼蛇神是蒯大富们；而对于蒯大富们来说，牛鬼蛇神却是工作组，也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

总之，1957年的学生运动既给共产党提意见，也给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1966年的学生运动拥护毛泽东，反对共产党，毛泽东坚决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唯一关心的是，你拥护还是反对他个人，但他并不关心你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一般地说，他对于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的6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都不真正关心。

那么，毛泽东1957年发起“整风运动”的初衷，是不是因为已经预见到有人会反对他自己，从而安排“引蛇出洞”呢？“反右运动”实际上是反知识份子。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已经把知识份子整得服服贴贴；在发动“整风运动”时，毛泽东没有必要对他们使出“引蛇出洞”的绝招。倒是1956年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关于“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使毛泽东如临大敌，但共产党怎么说也不是“洞里的蛇”。因此，关于毛泽东在“整风”时再三号召“鸣放”的初衷，“引蛇出洞”之说更像是事后编出来的答案。

考虑到当时皇帝、权力贵族和知识份子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对这一问题顺理成章的答案是，为“八大”的决议而龙颜大怒的“天子”想借助于知识份子和其他平民来整垮权力贵族，以后改变方向则是由于看到时机尚未成熟。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在1957年就已经小试牛刀的计画推迟了9年才付诸实现。

## 九、“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

在黑色的1957年，“大鸣大放”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即人民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推向前沿，权力贵族和“皇帝”联手，把55万“右派分子”送上了社会主义的祭坛，“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但是权力贵族也为这一胜利付出了代价。

象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的理论前提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要剪除的异己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右运动”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因此知识份子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既然如此，知识份子在“鸣放”时响应号召给党提的意见自然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了。教授治校——“资本主义复辟”，同人办报——“资本主义复辟”，内行人领导科技——“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一个中学校长要求对本校教师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也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所有这些要求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人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统治下或多或少已经争得的民主自由。但这些都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这样一来，中国知识份子终于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这个专政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原来是一个久违了的古代王国，这个王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在“反右运动”中，共产党第一次（虽然只是在私下）打出了“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政治旗帜。其潜台词是：“新中国乃是我共产党的私家王朝，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样，人们终于明白，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不幸的是，经过这次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改朝换代，人们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中曾经挣得的少许民主自由竟丧失殆尽。

为什么会这样呢？新中国乃是一个小农的王朝。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上层建筑乃是一个新世纪的古代帝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毕竟还有城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曾下决心在新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到了1957年，它已经基本上在新中国确立了小农王朝的上层建筑；但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从而不得不一般地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因此它仍然没有改变在城市实现“工业化”这一方针。糟糕的是，中国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新建立的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难免经常地、每日每时地长出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小农的王朝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不遗余力地清除过去的上层建筑的残余之外，还不得不在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同时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换言之，它不得不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这就是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相应地，任何使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意向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用语在语义学上是不是恰当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坚决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必须肩负的

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未必都十分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从切身的体会完全能意识到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自身的特权地位与物质利益的保障，因此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击“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贵族的存在，其本身与“皇帝”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面上看，“反右运动”的结局既是皇帝的胜利，也是权力贵族的胜利，实质上这一结局却更有利于“皇帝”，“反右运动”反的是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乃是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因此“反右运动”的胜利实质上是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胜利。诚然，权力贵族在它和知识份子的对立中代表已经建成的小农王朝来对抗上层建筑现代化的要求，从而代表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但是，在它和“皇帝”的对立中，却是以新时代的一党专政来对抗传统的个人独裁，这时权力贵族的地位倒了过来，它自己代表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其对立面“皇帝”则代表着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维护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那么权力贵族的存在和它对新中国的统治又怎能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呢？因此，仅仅凭藉历史的惯性，权力贵族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尽管陶醉于“反右运动”胜利的权力贵族一无所知，灭顶之灾却在一步步临近。

此后，随着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渴望日强，中国有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当上“国际共运的旗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却变成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伟大领袖对于自己这一“丰功伟绩”的第一个反应是，清洗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的精英（他们还依稀记得当年革命的目的是“穷人翻身”）。不管是否自愿，权力贵族自己也参与了这一次清洗。这次清洗使得全国继续滑向“大跃进”的深渊，其后果是饿死了3千万中国人。空前的灾难导致民怨沸腾，权力贵族与“皇帝”同样失去民心，但首当其冲的还是“皇帝”。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形势竟然迫使“一贯正确”的“天子”作了自我批评，权力贵族对皇帝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短暂的胜利却使得毛泽东与共产党（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之间的对抗公开化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实现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宿愿。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历史形成的，铲除它得有一个过程。在苏联，斯大林借助于宫廷政变，借助于秘密员警，通过“肃反”、清洗和暗杀，逐步铲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当上了“新沙皇”。新中国则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这一历史转折，根据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再次诉诸群众运动，于是“伟大领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运动”“扫四旧”，“斗牛鬼蛇神”，似乎漫无目标。只有当运动发展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军队支左”时，才显出其自身的本来面目：这是乡村起来反抗城市，这是武装力量起来压倒组织力量，这是“皇帝”起来铲除权力贵族。运动造成了普遍的毁灭：生命和财产，文化和科技，道德和人伦。

（1968年10月初稿；1980年11月重写；2005年8月修改完稿。）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书刊评论】

序《卞仲耘之死》

• 胡 平 •

这是一本真正用血泪写成的书。它激起我的万千感慨，决非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说尽。这里我只说一点。

◇ 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

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只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踏、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只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只有那些高

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心本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

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只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受。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只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点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

## 【抗拒遗忘】

为了法律的尊严——读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有感

• 格丘山 •

读了杨莉蓁“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后，深为本杰明·哈里斯律师的正义感感动。

其实中国在历史大治的时代对人命案也是非常重视的，所谓人命关天。尤其清朝，更是一丝不苟。老百姓如有冤屈，可以上告，甚至滚钉板告御状。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清朝并非独一无二。下面随便举一个嘉庆年代的粪坑案为例，可见清帝对人命的重视。由于手头没有原始资料，仅凭几十年前的阅读记忆写来，如细节有谬误，请谅解。

事情发生在嘉庆年西北的一个小城镇，正是秋收农忙时节，几个地主的长工去粪坑解手，

一起跌落粪坑死亡。长工家属告到县府，地主及其儿子被以谋杀罪判死刑。地主家属不服，上告到知府，省府，皆维持原判。地主家属仍不服，告御状。皇帝派出钦差专审此案，案至此时，已非长工与地主的对抗，而是所有经手这个案件的官员与皇帝的对抗，因为清朝法律极严，错判人命，轻者丢官，重者抵命。所派钦差受到各级官员的贿赂后，维持原判。地主家属再告御状，皇帝二派钦差，仍无法改变原判。最后皇帝请出御史，御史走前，皇帝亲自拜托。最后被证明是冤案，地主及其儿子被放，所有的审官都被摘去顶子，县官被杀了头。有趣的是这个案子的真凶从未被查出来，现代人猜测粪坑的毒气是杀死长工的凶手。

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的案件上来，本杰明·哈里斯律师站在法律的正义和对生命重视的职业道德高度上，追踪杀死卞仲耘的凶手。在追索过程中，本杰明对中国人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完全不能理解。

其实中国人面对的是无奈：

1、解放后冤案积压成山，屈死鬼无数，卞仲耘案件只是其中一件。如果要追查卞仲耘案件，那么别人怎么办？如果要全部追查，那么中国政府全部停公审案，恐怕百年也完不了。

2、这些案件的元凶很可能大部分就是现在政府的官员。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建立功勋，而爬上今天高位的官员，怎么可能手上没有几个冤魂屈鬼，所以他们本身就不愿查。

3、很多案件的凶手很难说清楚。例如卞仲耘案件，如果凶手是刘婷、或者宋彬彬、或者刘锦，那么她们当时都是不到十八岁的孩子，而且是在国家元首毛泽东煽动下做的，她们确实不能负全部责任。

再加上中国人很少有保卫别人的人权和公正，就是树立社会人权和公正，就是保护自己人权和公正的远识，奉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生哲学，怎么可能去管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的陈年公案呢？

难道由于这些理由，中国人就应该让这无数的人命冤死永远沉入大海吗？让中国的那一段历史永远成为空白，让中国人的良心和正义在那一段时间永远消失吗？

让我们看看由于我们的无奈和宽容，刽子手和御用文人是怎么说的？以下是在网络上摘录的原文：

“所谓别有用心是指，大凡改天换地的英雄，都会消灭或战胜他的敌人，也会触动社会一些阶层和人的利益，甚至难于避免会伤及一些无辜，制造一些冤假错案，因此，都必然地会招致他的敌人（包括其亲属）的仇恨，招致受损害人及其亲属的怨恨，这些人仇恨毛、指责毛，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社会的其他人，不会，也不应该因为这些人的仇恨和怨恨，就改变对毛的评价。一些人极端发泄对毛的仇恨，要鞭尸，要刨祖坟，不仅说明这些人不仅当年被时代淘汰，即使在今天，由于被仇恨或怨恨迷糊了双眼和心灵，仍然是与中国社会的主流格格不入的。”

“这些被毛整肃的人不向前看，别有用心地在现在中国发泄和煽动仇恨，我们根本不需去理他们。”

从这些令人心惊的话中，我们可见那些伤害和杀死了许多无辜生命的共产党人，至今毫无心理的悔悟，歉疚，他们反而厌恶受害者谈论往事，认为这是发泄和煽动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由于中国的正义没有被申张，几千万人的冤死没有换来刽子手的一点良心发现和歉疚。

我认为，像本杰明·哈里斯律师那样去一一追究中国的个案，要凶手伏法，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讨回法律的权威和尊严，那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发泄和煽动仇恨，而是让凶手知道法律是神圣的，正义不可被残踏。他们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不是因为他们是对的，不是因为他们有权势，而是中国的特殊年代，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那个年代造成的罪孽太多太深重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像本杰明·哈里斯律师那样去追查一些影响巨大的个案：直到当年的作案人不再在亡魂前推卸责任，抵赖，让他们知道法网恢恢，不可触犯；直到现在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文人不再认为过去被迫害的人是活该，不再认为对死者的纪念和对刽子手的控诉是发泄和煽动仇恨；直到他们就像当年德国总理，诚挚地跪在死亡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为德国人忏悔一样，心悦诚服地为他们伤害了无数中国人的罪孽感到良心歉疚。

我们鼓吹的不是冤冤相报，我们鼓吹的制冤者必须从心里知错。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将来的中国不再出现这种残忍的杀戮和迫害。

~~~~~

【更正启事】

本刊今年11月第608期中刊登余汝信先生《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该文有如下笔误，特此声明予以更正：

文章内所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数据〈1〉》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应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另外谈及关锋时称其为“山东兴云人”，应为“山东庆云人”。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